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二辑

良知传播

电视与三农关系研究

李升科 ◇ 著

“媒介三农”在“事实三农”、“政策三农”、“学者三农”的场域冲突中具有独特的塑造和中枢传动意义，而对于这个“意义”的忽略就意味着解决“三农问题”的链条断裂。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二辑

良知传播

电视与三农关系研究

李升科 ◇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知传播:电视与三农关系研究/李升科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657—0608—0

I. ①良… II. ①李… III. ①农村—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463 号

良知传播:电视与三农关系研究

著 者 李升科

责任编辑 黄松毅

封面设计 钟雪亮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608—0/G · 060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2012年10月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将“农民奖章”颁发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农民奖章”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高荣誉,是对一个国家促进农业生产、消除贫困而做出杰出贡献的最高肯定和褒扬。

“三农问题”是人类的大问题,在中国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当下,良知、正义、公平等等词汇,不仅人们耳熟能详,而且成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自上而下的呼唤和呐喊。这一点,对于弱势的、脆弱的“三农”更是如此。

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复杂得几乎令人窒息,而“三农问题”又是“复杂中的复杂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的其他问题相较而言就会迎刃而解。

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需要多种工具综合施治。其中,媒介传播尤其是对农电视传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工具作用呢?

实际上,研究“三农问题”的视角已经有很多。站在传播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既是对“三农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责任,也是对媒介的对象性传播研究的使命。这是该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客观地看,媒介的任何一种对象性或者非对象性的传播,都是充满着“良知性”的,这是由中国媒介的功能定位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把对农电视传播冠以“良知传播”的称谓呢?

这主要是由“三农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是它的弱势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既是一种充满情感的现状陈述,又是一种强烈的呐喊。二是我们国家从古至今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是却又会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者忽视“三农”,而这一点对于对农的媒介传播尤其如此,有时甚至非常严重。

所以,客观地不带情绪地看待媒介的对农传播,相较于其他的对象性传播而言,确实需要更多的道德性思考和更多的良知强化,这也是尤其需要强调的原因所在。

鉴于“三农问题”和对农电视传播的复杂性,该研究首次引进布劳迪厄的场域理论,化繁就简地把“三农问题”和“对农电视传播”看作两个自足的场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解剖了“媒介三农”、“政策三农”、“学者三农”、“事实三农”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对农电视传播与“三农问题”之间关系的错位与对位状态,探究了对农电视传播的公共性特征,并提出了不能把对农电视传播过度市场化的观点,以实现了对农电视传播场域与“三农问题”场域信息循环中的良性互动。

这是该课题研究的视角,也是其独特处所在。

作者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曾经长期在山东市级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游走于皇天后土之间所形成的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和乡村人文情怀,为进行这项研究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基础。

目前,国内对于这方面课题的独到研究还相对薄弱,有待更为详细、更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叶凤英

2012年6月

目 录

序 言 /1

导论 对农电视传播:一个不能忽略却常被忽略的电视现象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对农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不足及借鉴意义的分析 /13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结构和角度 /19

第一章 场域理论观照下的对农电视传播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25

第一节 对农电视传播的概念界定 /25

第二节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工具作用 /26

第三节 场域理论“关系分析”意义上的“媒介三农”的位置 /36

第四节 “媒介三农”、“学者三农”、“政策三农”的三角互动 /41

第二章 对农电视传播与“三农问题”的对位与错位 /63

第一节 对农电视史略 /63

第二节 国家—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三农问题”演变分析 /74

第三节 对位:舆论监督与典型报道、经济信息报道的立体结合 /83

第四节 错位:城乡电视对比框架下的忽略与漠视 /92

第三章	对农电视传播弱势化:多种力量较量的结果	/104
第一节	传统文化:重农与轻农思想的相悖性历史存在	/104
第二节	媒介消费主义:“三农”主体的受传者中心位置移向边缘	/110
第三节	权贵化取向:对农电视节目萎缩的心理症结	/118
第四章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对农电视传播的公共性特征分析	/125
第一节	分析对农电视传播公共性特征的意义	/125
第二节	公共经济学理论中公共物品的特征和分类	/126
第三节	在当下社会背景下对农电视传播属于准公共物品	/128
第四节	对农电视传播不能简单地市场化	/134
第五章	对农电视传播功能分析	/138
第一节	现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信息功能	/139
第二节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民性格塑造功能	/150
第三节	乡村自治下的政治功能	/157
第六章	建立对农电视传播的公共服务体系	/162
第一节	外部:以“村村通”和“西新工程”为主体的硬件建设	/164
第二节	内部:建立正确的对农电视传播价值观和科学的节目 评估体系	/173
第三节	媒介职业主义精神的建立与强化	/178
结语:	对农电视传播场域与“三农问题”场域信息循环中的良性 互动	/187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8

导论 对农电视传播：一个不能忽略却常被忽略的电视现象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一、城乡分割状态下的非理性“敌视”与“歧视”现象的警示

研究对农电视，源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及其在唤起社会注意和推动问题解决方面所能起到的媒介角色作用。

不管是当下还是既往，“三农”问题都是中国的大问题。目前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三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严重而迫切。“三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战略问题：国家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能否实现全面小康，能否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构建和谐社会，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等等一切的一切，都系于“三农”问题能否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当下的“三农”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发生在北京的两条新闻让人深感震惊：

一起来自农民：2006年6月8日《南方周末》刊载作者熊培云《艾氏911》一文，文中写道：2005年9月11日，32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车后在东城区灯市口附近将司机杀死，随后驾驶该车由北向南冲入王府井大街，直接造成3死9伤。据其供述，倘使车子不是被迫停下来，他还要顺着大街一路冲撞下去。从袭击后的心理反应

来看,艾绪强一直坚持自己“报复有理”的逻辑。当艾绪强听到“死刑”宣判时,面无表情的他竟然朝着受害人家属“微笑”。随后又面带冷笑扭向不断闪烁的镜头,仿佛自己是胜利者。如庭审法官所表示,自始至终艾绪强都没有悔过。这位32岁的农民为什么“冷酷”到如此地步呢?据其交代,他在城里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在北京开铲车打工,却没有得到工钱,因此对城里人产生一种严重的偏见——“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由于“无法在社会生存”,这个“人生破产者”走上了一条“报复社会,报复富人”的不归路。他之所以把报复地点选择在王府井,是因为“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①

另一起来自城市市民:2006年6月12日,一个网名为“北京政治老师”的网民在新浪博客上抛出《疾农民如仇》的惊人帖子。以“身份劣等就要挨骂”的逻辑惯性,认为“对农民也好,对外地民工也罢,都是社会最底层人员,都是应该被筛选、被改造的族群”。文中说,他“起码能代表绝大部分城市市民的真实心态”,“(城市人)面儿上维护一切,视人一律平等,暗地里早已像对待艾滋病般的提衣色变,厌恶,逃避,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他把农民的“粗卑表现”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农民都小农意识深厚”;“农民都生活习惯猥琐”;“农民都法制观念淡薄”;“农民都势利眼毒辣”;“农民都报复欲旺盛”;“农民都阴坏损”。另外,“关于农民,身边还有许多丑陋的现实,篇幅有限,暂且不再列举,”云云。外在方面:“农民都脏,不讲卫生,以净为耻”;“农民都臭,有个流行蔑称叫‘臭老农’,颇得神韵”;“农民都俗,穿衣品味奇差,审美观原始。”^②

“北京政治老师”其实是一个年仅25岁的网民,据新浪网对他的访谈,他“从小就没有接触过农民”,自幼在北京城长大,只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到乡下写生在农户家住过一次。他对农民的“粗卑表现”的

① 熊培云:《艾氏911》,《南方周末》2006年6月8日。

② 引文参见:“北京政治老师”:《疾农民如仇》, <http://blog.sina.com.cn/u/4766141d010004kq>

定义、判断，来自他个人的一种观察以及“媒介事实”这样的“二手事实”。《疾农民如仇》引起了传媒界的轩然大波，除了网络媒体，国内不少平面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与《疾农民如仇》中对农民“粗卑表现”的列举针锋相对，一些网民列举了城市人的“十大罪状”，并逐条进行了“精辟”描述。一起本来简单的“疾农事件”，演变成“城市与农村”的“口水大战”。

农民艾绪强以城市人十人有九人是坏人为逻辑起点，用现代交通工具对城市人实施“无对象”式的报复，撞死撞伤 12 人后，在被宣判死刑时面对受害者家属面露“胜利者”的“微笑”，与“北京政治老师”列举农民内在和外在粗卑表现时笔下所弥漫的对农民彻骨彻髓的厌恶与歧视，尽管都应归结为社会偶发事件，但却极其深刻地透视出城乡不同族群间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彼此间敌视、歧视心理状态的严重性及不可忽视。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财富总量有了迅速的增加。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安排下，自 2005 年起中国人均 GDP 达 1700 美元的财富收入。^①大部分“倾斜”到了富人的口袋，“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彰显。贫富不均甚至“杀贫济富”经济现象的膨胀、扩延，使本来就长期存在的城乡分隔进一步发展为城乡之间的“区位对立”，乃至相异族群间的心理歧视、敌视的非理性观念蔓延及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本来，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正常、非健康的心理，而中国现在正处于剧烈变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贫富差异的扩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本来就十分明显，如果危害社会的非理性心理不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潜在的或显现的“社会破坏能量”就会摧毁国家的“安全之缆”，甚至断送民族的百年复兴梦想。如果对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一个概览的话，“三农”问题无疑在所有问题中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① 数据来自中国新闻网新闻：《按 2005 年平均汇率计算 中国人均 GDP 为 1700 美元》，2006 年 01 月 25 日电。

二、社会转型背景下“三农”问题的症候与表现

1. 什么是“三农”问题

“三农”，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的综合称谓。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描述是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整个社会各项指标发展到一个新平台的背景下，由于受国家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等历史性和现实性原因的影响，“三农”的发展遭遇了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出现了农业、农村、农民整体性地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状况，并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失衡。

2. 当下“三农”问题的症候表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并非今天出现。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文明阶段，即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后工业文明阶段。农业文明又称为前工业文明，在这个时期，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三农”问题作为国之大计，任何社会主导阶层在考虑“国计民生”时，无不把“三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甚至还会出现“重农抑商”的极端行为。即使在我国建国后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在“工农商学兵”的社会阶层排列中，也把“农”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在今天的社会话语体系和传播语系中，“三农”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是指什么呢，它的症候或者说它的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经济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一种充满情感的现状陈述和呐喊。看一组数字：近年来农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5% 以下，常年维持在 14.5% 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也下降到 30% 以下，常年维持在 27%—28% 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8% 左右。农村有 9 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 8 亿的实际农村人口。^① 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了 1000 美元，但农村要远低于这个数字，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 年第 5 期。

其中还包括了少数“农村白领”的额外贡献。根据现代化理论，一个国家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过程中，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的时候，是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风险加大的关键时刻。处理不当往往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引发混乱。当下，我国大多数农村还是处于前工业时期的民俗型的乡村社会时期，农业还没有实现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商品化、产业化，抗风险能力很低，属于弱质产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已经由 1995 年的 2.72 : 1 发展到 2004 年的 3.3 : 1。经济上农民是苦的。

政治上。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行政主导型二元体制”，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农民尽管在经济上被排除在以制度化的户籍为屏蔽手段的城市生活外，但却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逐步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二元体制”。在社会管理中，市场力量的强化，行政性支配力量的相对淡化以至于在某些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充分唤起社会活力的同时，由于竞争起点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相对不公，导致农民政治权力的相伴弱化，自下而上的农民的声音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弱化情况。比如，来自全国的人大代表，城市中每 24 万人产生一名，农村却需要 96 万人。^① 其中真正来自农村的代表又多为农村的“经济强者”或“权力强者”。又比如，农民工问题是 2005 年“两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代表中却没有一名农民工。

文化上。农民是教育贫困者、信息贫困者；农村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区域。教育贫困和信息贫困者的两种贫困直接导致农民的能力贫困。现在，一名本科生的成本是贫困地区一个农民 35 年的收入。由于教育成本的提升，一些农村学子被排除在高校的大门之外，步入打工者即农民工的行列；而跨入大学校门读书的农村学生，则需要倾其全家乃至左邻右舍的经济资源才可完成学业。农村文化基础设

① 转引自张振华：《强化服务“三农”是媒体的历史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 年第 5 期。

施落后以至于空白,除了欣赏多以城市旨趣为标准制作的电视节目外,其他的文化活动时间就被落后的娱乐活动所填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民被排除在了主流文化之外。

社会福利的贫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低保”等社会福利体系没有覆盖到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大多数农民到了城市干部职工该退休的年龄时,还依然担负着最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扮演着壮劳力的角色。在医疗方面,小病舍不得治,大病治不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比比皆是。

3. “三农”问题的背景

(1) 中外精英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一位欧洲驻华大使回国后,在回答朋友对中国印象的问题时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与整个社会的这种反差,社会学家称之为“断裂”,意思是指“三农”被甩到了体系之外。

经济学家吴敬链 2005 年 3 月份接受“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不懂‘三农’”。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社会学家掀起了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毛泽东从做农民工作开始搞革命,强调说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的革命运动,所以中国的革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农民“土地革命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改变土地使用制度、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起的。所以解决好以农民为中心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以来,执政党把“三农”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宏大的现实意义的。

(2) 执政党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90 年代初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进步阶段。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释放了原先行政

严密控制的社会资源，并创造出资源自由流动的空间，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从改革中大为受益。第二个阶段为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国家利用税收、金融等手段，优先发展城市经济与工业，重新积聚资源于城市，使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现在我国进入了以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第三个阶段。2002年，党中央提出全面小康的大目标，因为没有农民的小康，中国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小康；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五个统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2004年党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因为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是科学的。2004、2005、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三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及2006年的两会，国家针对“三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的建设措施与步骤。“三农”问题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另外，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滞后，不仅仅会阻碍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也将会为城市的发展制造重重障碍，甚至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三、对农电视传播的弱势与人为忽略

方晓红博士在《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中，采用调查统计的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苏南农村媒介拥有和使用情况。苏南农村是中国农村经济发达、农民富庶的地方，但农民的媒介拥有和使用情况在多样性、现代性方面与城市相比较仍然差距明显。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介样式中，电视是农民获取外界信息最主要的手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农民在媒介拥有和使用方面，如果以苏南农村做参照的话，差距是巨大的。本书选择电视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找出电视对农传播与“三农”问题解决的背后关系及解决办法，也就具有很强的标本价值和代表意义。

国家的实力有软实力、硬实力之分，电视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具体到电视这个“子场域”来说,它又有自身建设方面的软件和硬件之分。对农电视传播在电视资源的总体配置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与错位现象,即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强势集团轻弱勢集体。

1. 硬件:对农电视传播的基础建设远为不足

“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的实施,政府作为民心工程来抓,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解决农民看电视难的问题。这种政府集中精力和财力的办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电视的问题,但由于基层财力不足和网络维护成本高双重因素的制约,“村村通”返盲情况相当严重,即电视信号不能时时通、长久通。此为其一。由于我国地形复杂,至今还有居住在边远地带的几千万农民看电视的问题没有解决,完成这一部分农村的电视通成本更高。此为其二。电视媒介渠道通到了村里,并不意味着节目就到了农民的家里和心里。由于电视媒介受市场和利润逻辑的制约,农民无法看到电视媒体专门为他们设置的频道、制作的节目。此为其三。《农民日报》总编辑张文宝在2005年的媒介服务“三农”的全国高层论坛上说:“‘村村通’工程只通中央一套,通不了七套。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在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七套节目)不到10%”。^①现在,城市观众一般能够看到几十套电视节目,同时城市电视开始向数字电视、高清电视、交互电视大踏步迈进,电视传播进一步专业化、小众化、个性化、多样化。这与农民连拥有自己的粗糙频道都缺失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2. 电视频道、栏目资源设置的城乡失衡

对这一问题的观察,需放在城乡对比的框架范围内。中央电视台目前设置了15个频道,只有七套是农业频道,其版面空间还被军事占去了一大块。省级频道只有山东、吉林、河北、河南、浙江开辟了农业频道。据截至2007年的资料来看,市级电视台只有山东临沂办了农

^① 张文宝:《科学发展观与“三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5期。

业科普频道。农业频道占全国 1254 个电视频道的比例为 0.4%。县级电视台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离农村最近,理应在服务“三农”方面更具有优势,但事实却是,许多县级台在节目、栏目、频道的规划策略中,也是高举城市牌。除了办公驻地在乡村的乡镇官员被纳入关注的视野外,农民不是被忽略就是以电视节目语系中的陪衬性符号出现。而那些专门为农民设置的栏目和节目也在整个电视节目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

3. 软件:对农电视传播中存在对农新闻价值判断严重扭曲等问题

(1)对农电视传播中存在着对农新闻价值判断的扭曲。

依据电视新闻的叙事话语,国内的电视新闻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硬新闻,一为软新闻。硬新闻叙事严肃,权威性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央视《新闻联播》;软新闻比较轻松,消遣与娱乐的元素多。各类的民生新闻、娱乐新闻,都属于软新闻,它类似于晚报、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硬新闻偏重于“宣传”与引导,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新闻判断的视野上往往覆盖为政策的解读与灌输,主要发挥“上情下达”的作用,对“事实”的“三农”存在一种疏离乃至疏忽。比如,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个层级的电视台几乎都在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栏目里开设了相似的“新农村”专栏,报道选择的对象多为多年以前就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村,有的甚至早就实现了城市化。当然,这种经验宣传和典型报道是电视新闻报道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国家的舆论生态建设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选材和报道视角的单一化、标准化以及报道量上的“信息洪流化”,给人作为判断依据的“媒介真实”是:神州大地到处已经是新农村。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典型覆盖整体的“事实”,造成了媒体的窄视、短视、偏视,缺乏深度性、对农的服务性与实践上的可参考价值。软新闻,主要以城市市民的视角而设计出来的电视节目,其选材和报道倾向主要满足城市人的口味,走的是消费主义道路,刺激与娱乐成为其主要特征。在类似于民生新闻的软新闻节目里,农民多是以负面的形象而出现的,比如,偷

窃、凶杀、跳楼、拐卖人口等,农民一词在新闻里的符号象征多为愚、贫、弱、贱、私。农民的这种负面形象掩盖了他们那种以勤劳、善良、质朴、吃苦、刚毅等为特质的“中华母文化”创造者的光辉一面。

(2)农民作为受传者在电视节目里的主体缺失。

央视《金土地》栏目改版为《乡村俱乐部》时制片人说,电视的对农传播与服务,不仅是对农频道、栏目,央视的许多频道、栏目、节目都在做着关于“三农”的报道。确实如此。但是,仔细分析电视以农为题材的文本时,就会看出其报道存在一种选材失衡的倾向:舆论监督节目把监督对象下沉到了“村支书”,在文本叙述框架里农民经常以诉冤者的身份而出现,媒体在为农民“泄气”的同时,伴生着某种身份、人格的矮化。在关于“三农”的正向报道里,报道对象大多为作为农民的管理者的官员阶层,或为农村的白领阶层,或为农民企业家等农村成功人士。真正的被报道主体——广大的农民,只是媒体报道框架里的配角,甚至可称为陪衬,透露出媒体对农报道外热内冷的被边缘化的一种实质。

(3)对农电视报道在信息的“实用性满足”和“精神性满足”方面匮乏。

信息的“使用与满足”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实用性满足”,一为“精神性满足”。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差序格局”被打破,将农民严密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退出了农民的生活范围,农民在整个社会中越来越“原子化”,农村管理一定程度地出现了“弱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多个方面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个体利益的博弈,需要多种相应的“组织庇护”,才能获得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博弈的力量,才能获取与社会进行谈判的优势。随着传统农业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的迈进,“三农”在生产、经营中对信息的需求更为强烈。市场社会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的自组织社会,农业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更需要真实、及时、准确、充足的信息选择,来消除自我决策的不确定性。媒介在实际的对农信息传播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